

南朝帝陵石兽与龙

□ 高敏 叶康宁

据笔者实地考察,南朝陵墓石兽根据造型特征的差异,大体可以分为两类:A型(图一)①头上有角(一角或两角)②脊椎凸起③颌下有长须④形体较长⑤身有双翼。B型(图二)①头上无角;②脊椎下凹③颌下无须④长舌外吐⑤形体较短⑥身有双翼。A型石兽常置于帝陵神道。和东



图一 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兽



图二 梁南康简王萧绩墓石兽

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兽(图三)大体一样,应该是天禄辟邪。B型石兽常置于王侯墓神道,类狮类虎,和《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记“状如虎,有翼”^[1]的穷奇颇相似。鉴于B型名称一直未发现铭文类确据,本文主要就A型(即帝陵石兽)展开论述。

和A型类似的有翼神兽形象可以溯源到商代^[2],但根据考古发现,该主题被固树并运用于陵墓神道则是在汉代,具体说来应该是在东汉。西汉时也有零星记载与发现。如未央宫中即有天禄阁,传为萧何建造^[3]。李零“疑天禄阁亦图绘天禄于内(或立其像于外),同麒麟阁。”^[4]江苏苏州虎丘农机厂也出土有西汉晚期的辟邪形铜座,器底有铭文“尚方作,河平元年五月甲子造。”^[5]河平是汉成帝刘骜的年号,河平元年即公元前28年。咸阳市博物馆现藏有两件玉辟邪,一件作昂首挺胸式,头上有双角,贴头顶向后弯;一件作低首匍匐状,头上也有双角,双角并合,角端向左右分开。这两件玉器都出土于陕西咸阳汉渭陵(汉元帝陵)^[6]。汉元帝刘驾崩于公元前33年,故它们的制作年代也不会晚于这个时间。美国华盛顿赛克



图三 东汉宗资墓辟邪

勒美术馆藏玉辟邪,“狮首似龙,亦昂首挺胸,头上有双角,背上有羽人为御,……可能也是时间(西汉晚期)相近的作品。”^[7]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东汉时期的天禄辟邪可谓不胜枚举。可以说,这一时期“形成固定形象的天禄辟邪。”^[8]

关于天禄辟邪的名实对应关系,历来争议颇多。据欧阳修《集古录》、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东汉汝南太守宗资墓前有二石兽,膊上有铭文,一曰天禄,一曰辟邪^[9]。《汉书·西域传》有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朱希祖据此再旁征元陆友《研北杂志》、明杨应奎《重镌汉宗资墓石兽膊字记》、明《一统志》、嘉庆《一统志》考证,一角即是天禄,两角即是辟邪^[10]。但浙江出土的一面汉镜上有独角翼龙式花纹,旁注铭文“辟邪”(图四)^[11],使这一考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而孟康之注是否为不易之论,也值得探究。萧常《续汉书》记:“符拔似麟而无角。”与孟注亦相抵牾,似乎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囿于学识与篇幅,笔者暂记数语以待后彦,本文姑从前贤。

笔者以为天禄辟邪形象既固树于汉代,必与此一时期或此前流行的其他艺术形象有联系。而这一形象笔者认为应该就是龙。最有力的佐证就是浙江出土的那面上有独角翼龙式花纹汉镜。在独角翼龙的旁边注铭文“辟邪”^[12]。李学勤曾通过比较良渚玉器上旋目兽面纹与饕餮纹的相似之处,得出二者有渊源关系的结论^[13]。笔者在这里邯郸学步,效法先贤,也枚举龙(图五、图六)与天禄辟邪的若干相似处,以求进一步证明二者的渊源关系。

其一,龙和天禄辟邪都有“S”型的身形。天禄辟邪的身形一般都很长,而且尾部也极长,这是除龙之外其他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的特征。

其二,龙和天禄辟邪头上都有角。而在神话传说中既有双角特征又有独角特征的(独角龙)只有龙。

其三,龙和天禄辟邪颌下都有长须。

其四,龙和天禄辟邪都有凸起的脊椎。

其五,天禄辟邪是身有双翼的,而在汉代人的想象中,龙也是有翼的。应劭注《汉书·礼乐志》曰:“訾黄,一名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而有翼龙在汉画中也极为普遍。

以上五点足以说明龙与天禄辟邪之间有不浅的渊源。

天禄辟邪在南朝只见于帝陵,王侯陵墓都是名



图四 东汉铜镜上的辟邪



图五 徐州铜台汉画像中的龙



图六 徐州睢宁汉画像中的龙

称待考的有翼狮虎兽。这一点似乎也在暗示着天禄辟邪属“龙”的特性。皇帝就是真龙天子,这种观念至迟在汉代已经被固树。

此外,天禄辟邪置于南朝帝陵前,应该和“天命”、“禄位”不无关系。如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给刘裕,诏书中就有:“是以天禄既终,唐、虞弗得传其嗣。”^[14]而最能代表“天命”的可能就是龙。自刘裕之后的南朝历代君主都热衷于在陵墓神道前安置类龙的石兽,是否有身后继续享受“天命”、“禄位”的私心在,是否想通过石制的天禄来昭示“天命”、“禄位”的永固呢?这些都很难考证了。

何星亮发现:“印度佛教中的狮子对中国龙形象的演变影响很大,唐宋时期的龙吸收狮子的形象。头圆而丰满,脑后披鬃,鼻子也近狮鼻。”^[15]笔者认为

这一影响早在汉代已经可见端倪。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佛教传入中土^[16],至南朝已经盛极一时,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确证。因此笔者认为天禄辟邪就是狮子化的龙。

[1] 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364页。

[2] 参看龚良《陵墓有翼神兽石刻的发展及其艺术源流》,《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3] 《三辅黄图》卷六《阁》引《汉宫殿疏》。

[4] 李零《出山与入塞·翁仲考》,文物出版社,2004年,66页。

[5] 管玉春《试论南京六朝陵墓石刻艺术》,《文物》1981年第8期。

[6] 张子波《咸阳新庄出土的四件汉代玉器》,《考古》1979年第2期。

[7] 李零《出山与入塞·论中国的有翼神兽》,文物出版

社,2004年,99页。

[8] 同上,第100页。

[9][10] 参看朱希祖《天禄辟邪考》,收录于涂湖平主编《南朝陵墓雕刻艺术》,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12]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420页。

[13] 参看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4] 《宋书·帝纪·武帝中》。

[15] 何星亮《苍龙腾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96页。

[16] 佛教传入中土的时间有多种说法,葛剑雄认为此说比较可信。参看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451页。

(高敏,武汉科技学院服装学院;叶康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

(上接36页)

[15] 六世纪“莲花化生”图案在于阗地区已有发现,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丝绸之路外国探险家的足迹》,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150页。

[16] 莲花化生纹样在北魏以后的石窟中出现的较多,仅举东魏及唐代两例,东魏时期的高庙山石窟窟顶即有莲花化生图案,见李裕群、张庆捷《山西高平高庙山石窟的调查与研究》,《考古》1999年1期,图一〇·2;龙门石窟的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净土堂门外北壁东侧即雕有莲花化生图案,见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石窟雕塑全集4·龙门》,重庆出版社,2001年,181页,图一八六。

[17] 北周时期的卫超王造像碑(北周武帝保定二年,即公元562年)、卫秦王造像碑(保定二年)、陈海龙造像碑(保定二年)、北齐鄧阳造像碑(公元550—577年)等都出现了莲花化生图案。以上造像碑均藏于山西省博物院。

[18] 敦煌石窟西魏壁画第二八五窟中即有手持乐器的莲花化生(又称伎乐化生),见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2·西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图版第八五。

[19] 李逸友《论内蒙古文物考古》,《内蒙古文物考古论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1~40页。

[20] 《魏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857页。

[21] 关于六镇名称说法颇多,见朱师辙《北魏六镇考

辨》,《辅仁学志》,第十二卷第一第二合期,1943年,1~21页。本文依学界通俗说法。

[2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34~435页注[8]。

[23] 石俊贵、王大方《内蒙古托克托县出土北魏佛陀瓦当》,《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1日。

[2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图版二四:1—2。以下称《朝阳北塔》。

[25][28]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

[26] 《朝阳北塔》,127页。

[27] 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2004年12期,图一三·2。

[29] 佐川正敏《永寧寺木塔の屋根瓦を復原する——九重塔の屋根瓦にみる天人誕生の理念。北魏洛陽永寧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報告》(日文版)》,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1998年,189~214。插图18:永寧寺九重塔屋根瓦复原图。

[30] (日本)吉村 怜著,卞立强、赵琼译《云冈石窟中莲华化生的表现》,《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6~26页。

[31] 王雁卿、高峰《北魏平城瓦当考略》,《文物世界》2003年6期。

(作者工作单位:大同云冈石窟研究院)